



《穆天子传》： 我国早期的“旅游文学”

□ 郎 朗

西晋初年，在今河南卫辉的一座战国魏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竹简，统称“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便是其中之一。后经西晋时期文学家荀勖等人校订，并以当时文字写成，最终成书6卷。《穆天子传》又称《周穆王游行记》，主要记载了周穆王在位时期的巡游经历，是我国现今所见的文字记载中最早的一次旅行记录。西周时期周天子治下及西北地区各部族的社会风貌、风土人情、神话传说也是该书

虚实结合的“游记”

清代所编的《四库全书总目》认为，《穆天子传》“夸言寡实”，将其归入“小说”一类。这实际上点出了本书的最大特色，即采用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将历史与神话想象亦真亦幻地融合在一起，对周穆王的巡游事迹予以描写。

周穆王姬满在位时间长达55年，是西周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除《穆天子传》外，其巡游事迹在其他早期的传世文献中亦有记载，如《左传》中提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周穆王意图留下他周游列国的车辙与马蹄的印记，所以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写道：“（周穆王）西巡狩，乐而忘归”。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感知周穆王是一位喜欢游猎的君主，《穆天子传》中的巡游记载有较高的可信度。传中提到的河伯氏族、西王母国也都存在于历史记录之中，这便是《穆天子传》中的“实”，真实的历史人物与相对可信的史实共同构成了本书的核心。

神话传说是基于远古时期人们的想象与难以理解的超自然现象的结合，更像是一种“神化”的现实生活，代表了人们对世间美好与未来的期许。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中，昆仑山不是具象的山，而是富有象征意义的神山。《山海经》中，昆仑山被视为天帝在人间的都城，是“百神之所”。我们所熟知的神话人物如伏羲、女娲等，均与昆仑山有着紧密的

关系。在《穆天子传》中，周穆王曾以盛大的礼仪祭祀黄河的水神河伯，河伯随后代表天帝赋予周穆王管理国家的使命，而后又向他指明了通往昆仑山的道路：“诏女（汝）昆仑口舍四平泉七十，乃至于昆仑之丘，以观春山之宝。”在遵循河伯的指引并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跋涉后，周穆王到达了昆仑山，他见到了黄帝的宫殿，拜访了雷神“丰隆”的墓葬。

在《穆天子传》的叙事中，作为现实存在的周穆王不仅见到了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到达了具体的地方，还与传说中的人物交谈、互动。神话褪去了一丝神性，更多地具有了人的特质，这使得神话走进了现实，历史真实与神话传说产生了深度交融。

“前丝绸之路”时代

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架起了东西方交流的一座桥梁。但在丝绸之路正式开辟以前，东西方之间已有交流。通过近些年的考古发现，学界认为在丝绸之路前，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主要以彩陶及玉石为主，西北地区则承担着经济与文化走廊的角色。周穆王是否真的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地到达今新疆等地，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但《穆天子传》中的记载可反映出西周时期中原与西北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

周穆王自成周（今河南洛阳）出发，向北渡过黄河，到达太行山后，又向西进发，随后在河宗氏族的引导下前往昆仑山。在整个西行过程中，周穆王及其队伍经过了诸多氏族部落，《穆天子传》对这些部落的位置、风俗都有一定的描述。地方上的氏族对周穆王一行表现出积极的欢迎态度，纷纷进献当地的特产，如昆仑山附近的赤乌人进献了酒千斛、食马九百、牛羊三千等物品。出于礼节，周穆王回赠给赤乌人黄金、贝带、珠玉等。作为天子的周穆王肯定不会贸然前往一个陌生的地区，因此这些记载基本上可以反映出西周时期中原与西域诸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条贸易通道。另外，从交换的物品来看，赤乌人的物品具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的特性，而周穆王回赠的物品则带有明显

的中原文化的特征，这些经贸活动是古代中国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在文化上的碰撞。

在神话传说中，“西王母”往往作为天界女神的形象出现，历史上的“西王母”应为西域地区一个强大部族。周穆王西行的目的地是“西王母之邦”，也从侧面反映出西王母部族在西域地区的影响力。根据一些学者的考证，西王母部族大概在新疆境内阿尔泰山区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即古代西域的境内，这里的居民可能是羌人，也可能是斯基泰人。对于西王母，周穆王给予了极大的尊重：“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宾礼是西周五礼之一，是天子接见诸侯的礼节，据《周礼》所记：“以宾礼，亲邦国”，此处不难看出周穆王对西王母部族的尊重。据与《穆天子传》同时出土的《竹书纪年》所载：“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由此可见，“前丝绸之路”不单单是经贸之路，更是文化交流之路，它不仅从空间上拉近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距离，更促进了二者在文化上的交融，为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德治之萌芽

在周人看来，殷商的灭亡主要是由于统治者的残暴和对人民的压迫，统治者的“无德”引起了周边部族的反抗。周自建立之始，便十分注重对“德”的追求，并逐渐演化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等思想。周人认为，他们的权力来源于“天命”，“天命”的归属则取决于君主是否具有德行。因此，周人十分重视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对“德”的追求。从《穆天子传》中，我们便可看出周人追求的“德治”思想。

其一，遵守礼仪规范。“德”作为一种抽象的理念，往往需要现实中“礼”的配合。作为外在行为规范的“礼”能够保证“德”的践行，周公制礼作乐意图潜移默化地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穆天子传》中所体现的礼仪十分周全，如在到达许国并接见许男（“男”是爵位的一种）时，明

确提出“去兹蒸，用玉帛见”，认为许男的行为不符礼仪的规定，最终许男折返并带上了束帛和玉璧，这才得到了周穆王的接见。在巡游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宴请各部族首领，还是在同西王母宴饮时，周穆王也都严格遵循相关礼仪规范，使用包括“觴”“殮”“炊”等不同的饮酒礼仪。当所有的礼仪得到严格遵守时，“德”的贯彻变得水到渠成。

其二，关注人民的疾苦。民心的向背往往是衡量君主德行的重要指标，也代表了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低。周穆王巡游至中原地区时，“日中大寒，北风雨雪，有冻人”。在目睹了百姓因天灾而受苦时，周穆王十分伤感，悲哀地唱道：“嗟我公侯，百辟家卿，皇我万民，旦夕勿忘。……余一人则淫，不皇万民。”对自己沉迷于游乐，不能及时匡扶百姓予以深刻反思。在周穆王看来，百姓之所以遭难，与自己官员的失职乃至失德是有直接关系的，这蕴含着早期的“民本”思想。

其三，“和为贵”的理念。国家间的和平、人民间的和谐历来是中华民族孜孜追求的理念，“和”也是“德”的目标。在一次巡游之中，毕（国）人通报戎人来侵，于是周穆王派遣孟念前往帮助毕国，这是《穆天子传》中仅有的一次战争记载，而且这次战争还是被动地抗击戎人的“入侵”。《穆天子传》通篇充斥着追求和平的思想，无论是在面对西域各国时的友好往来，还是对战争的极力排斥上，无一不显示出对内治理与对外交往中“和为贵”的思想。

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历来离不开文化典籍的传承，丰富的典籍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色。正如《穆天子传》，虽是一部虚实结合的游记，却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体现出兼收并蓄的文化内涵。

历史文化

典籍



秋风秋雨、秋山秋水等有形之物可观可状，固然易引起悲喜之情，然而稍纵即逝的声音与见仁见智的玄理，特别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象征意蕴，似有似无，妙手偶得。欧阳修的《秋声赋》，就是这样的佳作。后世以“六一风神”称道欧阳修的文风，又有“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的说法，透过该文可得一斑。文章以“秋声”为题，似了无深意，然而“知人论世”，可以反复涵泳。

文章开篇以散取骈直入主题，即“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颇有“环滁皆山也”的简洁清晰。“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澎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纵铤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听觉、触觉相互交织，挟清凉之气的秋雨淅淅沥沥，瞬间波浪翻涌、风雨袭来，清冷砭人肌骨，因此又幻化为刀枪铁骑瞬间奔突而来。理智随即登场，于是发问“此何声也？”此时，反而是置身事外的童子更加清醒，“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寥寥数语开篇，却将诸多感觉融于想象，在和谐的声韵中流动，创造出似真似幻的境界，如同丹青妙手将秋声作为可感的水墨一样在纸上晕染开来。

随之作者便充分展现了“赋”的“体物”特征。一扫重章叠唱、直接铺陈的传统“赋”法，从自然世界和人文价值两个方面回答了上述问题。为何秋声“悲哉”？只因秋色惨淡、秋容清明、秋气肃冽、秋意萧条。文辞韵脚和谐、音调铿锵，简洁整饬，铺陈出自然界中“秋”的特征，由声至感，由感至理，又由理至论。于是作者感慨遂深，认为悲秋之声所过之处无不凄凄切切，纵然草木山石也为之动容、闻之色变、感之叶落。

欧阳修叹道：可悲。这就是秋声，它为何而来？它色调暗淡，烟飞云收；它形貌清新明净，天空高远；它气候寒冷，刺人肌骨；它意境寂寥，山林空旷。所以它凄凄切切，呼号迅猛，绿草繁树使人快乐。秋声拂过草地，草则变色；掠过森林，树即落叶。秋声折断枝叶、凋落花草，使树木凋零。秋天，是刑官执法的季节，它属阴；发出铿锵之气，五行上属金。天地之严凝之气，以肃杀为意志。自然对于万物，是要它们春天生长，秋天结实。所以，秋天在音乐的五声中又属商声。商声是西方之声，夷则是七月的曲律之名。商，也就是“伤”的意思，万物衰老了，都会悲伤。夷，是杀戮的意思，草木过了繁盛期就应该衰亡。

这段文字的笔锋从自然转向人文，试图在传统中安顿个人的想象、体验与感慨，以舒缓因自然变化所引起的紧张之情。《周礼》“秋”配“刑”官，阴阳二气中属“阴”，五行属“金”，五音属“商”，五方属“西”，而时值农历七月，又配十二律中的“夷则”。可以说，从周礼制礼作乐以



来的典章制度中，从五行、五方、五音等所建构的自然与人文合二为一的传统世界中，“秋”天然与“悲伤”“杀戮”等相关。这种天人合一让“秋声”之“悲”从自然之理转为人文之理，看起来顺理成章。

一念至此，天地“常理”幡然明白，于是作者迅速做结：草木无情，尚且闻秋声而萧条，何况人是万物之灵长，更易多愁善感。还有生活中的诸多忧愁烦劳，又如何能追求永恒？万物的改变本是理所当然，自然界与儒家人文世界并未曾执着于身体的永恒，自己又何必闻秋声而叹恨？

欧阳修再看童子，早已垂头而睡，全不像自己怨恨悲愁、慨叹永恒，好似一个“百忧不感其心，万事不劳其形”的大智者。相较之下，慨叹生命易逝，不过虫声唧唧。作者或在自嘲，只留无限遐想。文章一唱三叹，摇曳生姿，韵味悠长。

《秋声赋》500余字而成名篇，必不只关辞采。“知人论世”，文章富含哲理与底蕴，令人感慨遂深。



（上接1版头条）

早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邓小平实际上已经在思考“三步走”发展战略的轮廓。1980年11月11日，他在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说：“中国要摆脱自己的贫困，绝不是本世纪末的事情，甚至于还需花下个世纪的一半时间才能达到”。1982年8月21日，他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经过几年实践的检验，邓小平在1984年下半年形成了翻两番任务肯定能够实现的明确判断，因此，他开始提出下一步如何走的问题：“翻两番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

家的水平”。从1986年开始，他细化70年蓝图中后50年的设想。他在会见外宾时说：“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有了本世纪末的基础，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将更加强大，对世界和平就更加有利”。

把这个蓝图变成“三步走”发展战略，变成全党共识和国家大政方针，整整花了7年时间，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时才逐步完成。

邓小平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设计了中国现代化70年发展蓝图，这是他留给党和人民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大风大浪，他始终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紧紧咬住这个目标不放松，直到干好干成。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他谆谆叮嘱党的各级干部：“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

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新时代的伟大变革在理论和实践上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说：“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擘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一天天走向繁荣富强，中华民族正在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2017年，党的十九大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作出新的宏伟擘画，把邓小平规划的中国现代化70年发展蓝图中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时间提前了15年。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接续奋斗，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研究员）

（上接1版三条）张汤死后，家产不超过五百金，都是他的俸禄和赏赐，没有其他的产业。但即便如此，张汤死后，因为他攀附君主而严苛对待民众，民众并没有赞扬和思念他。

《史记》虽然记录了张汤本人在对待财物上的节制，但是却没有对他如信陵君、申屠嘉那样赞赏，原因在于张汤将君主的意志和特权凌驾于法律规章之上，甚至不惜以严刑峻法来满足君主的主观好恶。这也是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的一种贪腐表现。公生明，廉生威。大公无私、清正廉洁不仅要求对物欲的节制，也要求对权力的约束。张汤的行为使百姓苦不堪言，也为西汉带来了长远的负面影响。

崇尚淡泊名利，摒弃庸俗鄙陋

在人与己的关系上，《史记》倡导有修养、有节操，反对只以地位高低或财产多少评价人物的庸俗鄙陋认识。廉洁的根本在于对道德底线的坚

守和对道德境界的追求，在于通过制度约束、教化引领、道德修养等方式达到思想和行为的完全一致。

《史记》记载，皋陶倡导人为政的“九德”，“简而廉”就是其中之一，意思是为人要平实而清正。成汤提出“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意思是人从水中可以看到自己的样貌，从百姓的状态中可以看到国家治理的好坏。成汤一方面注重从制度设计上保证官员清廉、政治清明；另一方面注重加强官员的道德修养和觉悟，自觉体恤爱护民众。

此外，《史记》还记述了恭谨勤勉、淡泊名利的人物楷模，正考父就是其中代表。正考父是春秋时期宋国的大夫，辅佐过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三代，曾经三次受过晋封的任命。但他地位越高，为人却越谦逊，还特地在鼎上刻下铭文：“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着背，三次提拔要弯着腰。

连走路都要靠着墙走，别人却都不敢欺侮我。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鼎粥糊口就满足了。

从为人到为官，从修身到齐家，自尊自重、清正廉洁，则人人得以尊敬；自轻自贱、不重名节，则人人得以轻视。《史记》充分肯定了正考父严以律己、谦恭从政、忠义传家的美名，强调廉洁要以自律自守、修身节用为根本，达到心怀天下、淡泊名利的境界。

总体而言，《史记》通过史实记述、人物评价和经验总结，表达了塑造廉洁文化的多个层次和系统思考。真正做到廉洁，要处理好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己之间的关系，知止有定、公正廉明、淡泊名利，反对贪污受贿、特权专断、庸俗鄙陋。《史记》中的廉洁文化内容丰富、细节充实、寓意深刻，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够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鲜活资源和思想智慧。

（作者系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